

论马丁·布伯的社区社会主义与基布兹^{*}

李 勇^{**}

【摘要】在对主客二分的二元论哲学以及资本主义工具性社区的批评前提下,马丁·布伯提出了基于“我和你”关系的新社区概念,并形成了社区社会主义理论。当这种理论与基布兹实践相遇时,理论与实践之间的一般性矛盾也就暴露出来了,实践的历史性、具体性与多样性使得原本的理论得到修正和发展,从而形成了基布兹社会主义思想。布伯也成了为基布兹社区建设提供最有力理论支撑的哲学家。发展后的社区社会主义理论虽然在一定程度上适应了基布兹社区建设,但理论与实践始终没能统一起来,布伯理想中的社区与现实中的基布兹始终不是一回事。从现今以色列基布兹发展轨迹来看,布伯社区社会主义理论的实验实际上是失败的。

【关键词】社区社会主义;犹太教;基布兹

马丁·布伯(Martin Buber)是20世纪最负盛名的犹太哲学家之一,其对话哲学为国内学界所熟知,其代表性专著《我与你》的中译本亦于2002年出版。同时,布伯还是社会主义犹太复国主义理论的主要奠基人,他曾积极参与了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和哈西德思想复兴运动,并因此活跃于以色列政治、社会、宗教与文化界。布伯理想中的犹太人的国家是一个基于社区社会主义的联合体,而这种社会主义与彼时国际社会中的主流的社会民主主义和国家社会主义非常不同。

^{*}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以色列宗教与政治、社会研究”(22JJD730004)阶段性成果,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以色列基布兹社会主义的实践与理论研究”(21YJC710014)阶段性成果。

^{**} 李勇,山东大学犹太教与跨宗教研究中心暨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副研究员。

一、新社区的概念与基本特征

1900年,布伯在一场以“新社区”为主题的研讨会上宣读了他的《新旧社区》一文,首次提出了“新社区”的概念。^①“新社区”是布伯社区理论与社区社会主义的起点,它不仅在布伯思想中占有持续性的重要地位,而且在现代社会学中也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因为《新旧社区》“是一篇开创性的社会学论文,也是一份引人注目的政治宣言,提出了一个全新的、实际上是革命性的概念——新社区。如果布伯在1900年后没有写任何东西,单是这篇开创性的论文就能保证他在20世纪的社会学、政治学和乌托邦思想史上的地位”^②。自此,布伯对新社区的关注就从未中断过,“虽然布伯思想在随后几年里发生了彻底转变,但这种将社区经验精神化解读以及从人内在生活的角度来理解社会政治问题的倾向却反复重现”^③。那么,对布伯而言,新社区的内涵有哪些?

第一,新社区并不是对古代理想社区的回归。在人与人之间自然联系松散的个人主义时代之后,我们不可能找到回到古代理想社区的路,并且古代理想社区并非完美的社区。布伯对此说道:“从美丽而粗糙的原始社会走出来的人类,在经历了社会的日益奴役之后,将到达一个新的社会,它将不再基于血缘关系,而是基于选择性亲和力。”^④“原始人本能的基于生命的团结关系一直是支离破碎的和分裂的,新社区只是在一个更高的水平上以新的形式回归这种团结关系。”^⑤

第二,就新社区的本质要求而言,新社区必须基于“完整的人的活生生的相互作用”形成。新社区以创造性原则取代了功利性原则,允许个人发挥其作为人的全部潜能。新社区最本质的要求是克服现代社区与社会的弊端,并且吸收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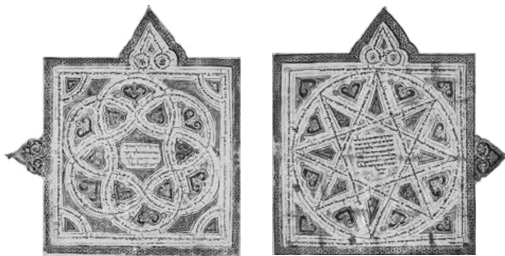
① 马丁·布伯在1900年的一场以“新社区”(neueGemeinschaft)为讨论主题的会议上宣读了题为《新旧社区》(“Alte und neueGemeinschaft”)的论文,但是布伯的这次发言在他生前从未发表过,直到1976年才得以发表,参见 Paul R. Mendes-Flohr and Bernhard Susser, “Alte und neueGemeinschaft: An Unpublished Buber Manuscript,” *AJS Review* 1 (1976): 41-56。布伯发言的手稿现今保存在耶路撒冷的犹太民族和大学图书馆(Jewish National and University Library)的马丁·布伯档案(Martin Buber Archive)中,文件编号为47/b。

② Michael Löwy, “Martin Buber’s Socialism,” *Journal of Jewish Thought & Philosophy* 25 (2017): 96.

③ Paul R. Mendes-Flohr and Bernhard Susser, “Alte und neueGemeinschaft: An Unpublished Buber Manuscript,” 45.

④ 布伯在《新旧社区》中使用了“选择性亲和力”(Wahlverwandschaft)概念来描述一系列社会和文化关系,这是社会学上一项出色的创新;马克斯·韦伯在6年后的1906年采用了同样的概念来描述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之间的复杂关系。

⑤ Michael Löwy, “Martin Buber’s Socialism,” 97.



代社区所取得的成就,如个人自由原则。新社区反对功利主义的压迫性力量和狭隘的专业分工,因为这使得现代社区成为一个奴役性的世界。它不像古老社区那样被某种观点束缚,如部落、宗族、宗教教派,因为此类束缚会形成教条和僵化的律令。新社区是被一种以自由和创造力为特征的共同生活束缚,一种由自由个体的相互吸引所约束。

第三,新社区最大的特征在于其有机性。新社区的力量并非来自原始增长,而是来自有意识的行动,这种行动的目的是通过自治性公社(Gemeinden)的联合来建构一种社会主义的生活形式。^①换言之,社会主义的任务是建立一个伟大的人类联合体,这个联合体由公社性的社区组成。社会主义在新的生活方式中成长,在同志般的友谊中成长,在与教堂里信仰不同的博爱中成长。^②要理解这种有机性的共同体,我们需要借助布伯哲学中的几组概念。一是“关系”的概念。“关系是存在的范畴,它是准备好的(面对存在的完美存在)……它是与自身有关的‘先天的你’。一个人对先天的你的认识是关系的先验,但同时‘先天的你’在我们遇到的你中被实现。”^③也就是说,“与生俱来”的“你”是在我们生活的关系中实现的。因此,关系(不是任何关系)是一种媒介,通过这种媒介,人可以了解他内心世界最真实的部分。“先天的你”,即那个与存在有关的不变的自我,只在与永恒的你直接关系中才能达到完美,也因此“你”不能被分解成任何细分部分。“永恒的你”是“唯一真理的世界”。二是在这种基本关系范畴下,又会产生两组重要的关系,即“我和它”的关系与“我和你”的关系。“我和它”的关系来源于一个支离破碎的自我中产生的对关系的一种态度。在这种状态下,一个人将自己与他人拉开距离,在人际关系中创造一种以强调差异为特征的关系质量。与此相反,当人处在先天的“你”中时,这种人际关系就构成了“我和你”的存在模式。这种关系运动就能在人际空间中建立一种布伯所说的“之间”的品质,换言之,“之间”属于“我和你”的关系。但是“我和你”的关系又不是稳定的,因为“我”不能在长时间内维持内在的统一性,“我”会反复分裂成独立的“我”;因此“人总是处在存在状态之间,在内在的统一性和分裂性之间不断交替”^④。可以说,“我和它”与“我和你”分别对应的是“以自我为导向的我”和“以人为导向的我”。前者在与他人的隔离中实现一个特殊的“你”,后者则在与他人的相遇

① 参见 Michael Löwy, “Martin Buber’s Socialism,” 99。

② 参见 Martin Buber, *Gemeinschaft*, vol. 2 of *Worte an die Zeit* (Munich: Dreiländerverlag, 1919), 18-19。

③ Martin Buber, *I and Thou*, trans. Walter Kaufmann (New York: Scribner, 1970), 78。

④ Dan Avnon, “The ‘Living Center’ of Martin Buber’s Political Theory,” *Political Theory* 21 (February 1993): 58。

JEWISH STUDIES

犹太研究

第22辑

和关系中实现存在状态“永恒的”“先天的”“完美的”“你”。只有在“我和你”的关系中,我们才可能建立一个生活共同体。

第四,真正的社区是在“我”的存在完全敞开的状态下,在“我和你”的关系中通过对话实现的互惠关系之间的共同体联盟。“社区是建立在活生生的互惠关系之上的,建设者是活生生的、活跃的中心”^①,对话关系不仅涉及横向的“我和你”,还涉及纵向的“我和你(社区的建立者)”。单靠特殊感情维持的社区不是真正的社区。在布伯那里,真正的社区建立者是那些“典范人物”,他们是“那些与存在相遇,并在相遇后留下对存在持有包容性态度文化的人,而且他们证明了他们的经验具有真实性;这些人站在伟大社区的开端,站在人类转折点上强大启示的背后。这些人主要不是政治领袖……而是那些建立了人类可以更充分认识自己的生活方式的人,他们导致了人们对关系之意义和重要性的彻底重估”^②。如佛陀和苏格拉底就是这样的建立者。一言以蔽之,布伯那里的真正的社区是基于伟大文明的创始人所建立的行为范式。

第五,至于如何在现代社会实现真正的社区,布伯认为有两点是极其重要的。其一,人的认识的转变。布伯认为,一个真正的社区始于“对现实的元心理特征的发现,并建立在对这种现实的信仰之上……在像我们这样的时代,共同体只能在突破中发生,在转折中发生”^③。也就是说,新形式的共同体社区起源于一个人(或一群人)对存在的本质的新认识。其二,作为手段的政治革命是必要的。但在布伯那里,政治革命的任务只是把社会从阻碍其按照公共主义精神重建的经济和政治障碍中解放出来。推翻既定政权的政治革命只是作为社会主义道路上的一种必要手段出现:一旦社会主义发展出它的组织力量,一旦它自己的社会目标出现,它就会摆脱它的“政治包装”。根据布伯的说法,马克思与乌托邦社会主义者一样,都希望政治原则被社会原则所取代,并且社会主义离开了政治革命是没有生命力的。^④

第六,真正的社区只在社会主义那里才有可能,而且社会主义只有作为真正的社区才有意义。社会主义拒绝所有僵化的制度。因为“社会主义永远不会是绝对的事物,社会主义是人类共同体持续地向人们走来”,社会主义是“精神的颠覆……永久性的”。^⑤ 真正的社区也正是代表着这样一种理念,它不是一个僵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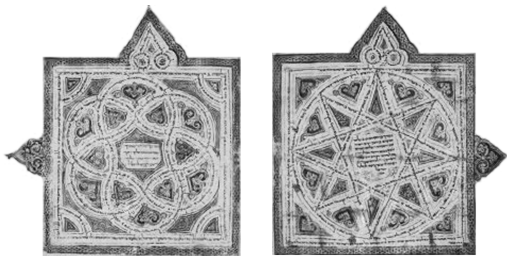
① Martin Buber, *I and Thou*, 94.

② Dan Avnon, “The ‘Living Center’ of Martin Buber’s Political Theory,” 62.

③ Martin Buber, *A Believing Humanism*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67), 151.

④ 参见 Martin Buber, *Paths in Utopia*, trans. R. F. C. Hull (Boston: Beacon Press, 1958), 82.

⑤ 同上, 51, 56—57。



的原则,也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而是一个活生生的形式。社区的实现就像任何想法的实现一样,不可能一劳永逸,它必须始终是当下问题的答案。^①

布伯新社区或真正社区概念的提出有如下四个基本前提。其一,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德国新浪漫主义。这种浪漫主义融合了文学乌托邦主义和神秘主义,其目标是“实现最高的理想,带来王国的繁荣”,浪漫主义者坚信“我们所有最崇高的观点和愿望都可以转化为事实和生活”。^②其二,“我”与世界内在统一的哲学。这种哲学反对将“我”与世界主客二分的二元论哲学及对事物背后不可捉摸的“物自体”的寻找,转而认为“你就是事物本事,你就是上帝……是实体”^③;一旦理解了物质与“我”的辩证统一性,“我和世界之间的深渊就被弥合了……旧的二元论因此被克服,因为一个人总也是另一个人……整个世界不过是我的‘我’,而我的‘我’就是对我而言的外部世界”^④。因此,作为物自体的我们不需要去寻找真理,因为我们就是真理,在我们最深层的主观意识中,我们与存在、人和物之间存在着普遍的具有共同体性质的一致性。其三,对资本主义及其社会形式的批判。布伯认为随着资本主义的兴起,旧的社会结构解体了,原有的多元性的复杂社区被一种单一形式的资本主义社区所取代。“资本主义形式……使社会原子化。资本主义控制着机器,并在机器的帮助下控制着整个社会,它只想和个人打交道;而现代国家通过逐步剥夺群体的自主权来帮助和支持它。”^⑤即使资本主义国家强制建立的各种社区,也改变不了现代社区的单一性,而社区与社区之间、人与人之间的隔绝状态也就不会改变。其四,资本主义现代社区与欧洲传统社区的比较研究。现代意义上的社区是近代资本主义和工业文明的产物。随着近代欧洲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兴起,大量人口开始迁往城市并依附于工业生产体系和新型的农业生产体系,于是有了以空间划分为基础的社区。传统社会逐渐解体,传统社会中由家庭、村庄、前现代城镇共同组成的社区有机体也解体了,传统社区“受习俗、习惯和仪式的制约;家务、农业、手工业等领域劳动的动机是快乐与生产的喜悦;其社会关系也是基于互助和信任,并且社区的精神生活受到宗教、艺术、伦理和哲学等因素影响。相比之下,以城市、工厂和官僚机构为特征的现代社区是人为的和机械的,它的运行由合同、计算、投机和利润来调节。赚钱是劳动的唯一目的,在现代商业和工业中,劳动被降级为纯粹的工

^① 参见 Martin Buber, *Paths in Utopia*, 137.

^② Paul R. Men des-Flohr and Bernard Susser, “Alte und neue Gemeinschaft: An Unpublished Buber Manuscript,” 42.

^③ 同上, 43.

^④ 同上。

^⑤ Martin Buber, *Paths in Utopia*, 139.

JEWISH STUDIES

犹太研究

第22辑

具;社会生活……以技术和工业进步来衡量……被利己主义和霍布斯式的所有人对所有人的战争所规范”^①。正是基于这些条件,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欧洲文明转型的评判潮流中,很多批判家基于对现实的不满,希望回归过去的社区传统。

二、新社区与基布兹社会主义

在布伯那里,新社区是对所有旧社区的超越;这种社区包含所有的现代自由,并且远远超出了资产阶级社会和它的规范。新社区也是一个关于现代社会的乌托邦替代方案和政治宣言。^② 新社区是社会关系中原始社区类型和现代自由社区类型之外的第三种“理想的社会主义类型”;并且新社区与社会主义在本质上是高度同一的,新社区只有在社会主义中才能实现,而新社区也是彰显社会主义真正意义的最佳手段。从布伯的社会生活与学术轨迹来看,他一直试图促进这种理想的共同体生活中心的出现。

在布伯首次阐释新社区概念的19年后,第一个基布兹于1920年在巴勒斯坦地区正式建成。以色列基布兹联合会给基布兹的定义是这样的:基布兹是以色列的独特产物,是一种集体和合作的社区生活方式,内部实行民主管理,基布兹承担所有成员及其家庭的福利责任,基布兹的生产资料与产品由基布兹人共有。^③ 第一个基布兹的建立与布伯的新社区之间是否存在某种实践与理论的关系,我们现在无从得知。但是布伯的社区社会主义思想与以色列的基布兹建设运动产生了共鸣是可以肯定的。布伯是唯一从事基布兹哲学研究的哲学家,也是为基布兹社区建设提供最有力的理论支撑的哲学家。^④ 布伯在1938年移居巴勒斯坦后就一直以基布兹理论家的身份活跃于基布兹舞台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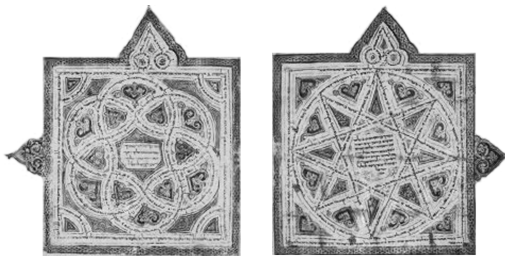
早在1928年,布伯在德国的以色列工人同盟会的会议上就以“为什么以色列国的建立必须是社会主义?”(Why the Building of the Land of Israel Must Be Socialistic?)为题作了发言,该发言不仅在以色列基布兹中广泛传阅,而且也奠定了布伯的基布兹社会主义理论的基础。布伯在发言的最后说道:“我看到了

① Michael Löwy, “Martin Buber’s Socialism,” 96.

② 同上。

③ <http://www.kia.co.il/infoeng/kibbutz.htm>.

④ 参见 Henry Near, “I-Thou-We: Buber’s Theory of Community and the Kibbutz,” *Economic and Industrial Democracy* 7 (1986): 247.



以色列最伟大的价值以及以色列工人阶级的伟大能力。”^①而《通往乌托邦的途中》^②一书是布伯的社会主义犹太复国主义思想的核心文本,这本小书有两个目标:一是勾勒社会主义乌托邦形式的历史;二是展示更美好的世界图景,不同于传统的、通过暴力革命实现的共产主义模式。布伯在书中详细梳理了乌托邦思想从蒲鲁东、克鲁泡特金、兰道尔、马克思到列宁的发展历程,最后布伯认为:我们可以通过更新社会的细胞组织来更新社会,从而进入共产主义;基布兹社会主义则是解决犹太人问题的可选方案,并被誉为现代人危机的解决与走向社会主义的可行模式之一。布伯思想在基布兹中的地位总体上来讲也得益于这本书中所描述的乌托邦社会主义;同时,这本书也代表着布伯对基布兹最为有力的支持,对基布兹内外都有着不可小觑的影响。在布伯那里,基布兹不仅是人类走向共产主义的“不曾失败的实验”^③,而且“如果莫斯科代表着社会主义的两极之一,那么它的另一极则是耶路撒冷”^④。布伯认为,人类历史上出现过很多次建立乌托邦社会主义(真正的社区社会主义)的尝试,其中最重要的模式有两个:一个是俄国革命模式,另一个则是巴勒斯坦地区的基布兹模式(当然,布伯在1947年完成了《通往乌托邦的途中》一书,此后的社会主义建设模式,如中国的社会主义模式,并没有进入布伯的考察视野)。在布伯看来,前者的尝试是失败的,因为革命政治的中心主义从一开始就支配着社会的重建,也就是说政治革命成功之后,政治原则没有被社会原则取代;俄国的苏维埃一直只是政治权力的工具,而不是作为社会再生的细胞和作为生产者自主管理的基础。而基布兹虽然有其局限性,即使不能称之为成功的社会主义,至少也能称之为“还没有失败的实验”。因为在基布兹那里,真正的社会主义社区被建立起来了,他们能够在彼此“之间”建立“联系”,并对整个社会产生组织性和结构性的影响。最后,布伯断言,基布兹模式不仅是苏联模式的一种可能性的替代模式,也是战后欧洲社会的榜样,欧洲社会可以通过走社会主义道路来重建其经济生活。

如果说布伯社区社会主义的理论承载体是其新社区理论和对话哲学,那么

^① Shalom Lilker, “Martin Buber and the Kibbutz,” in *Kibbutz: An Alternative Lifestyle*, eds. David Leichman and Idit Paz (Ramat Efal: Yad Tabenkin, 1997), 77.

^② Martin Buber, *Paths in Utopia*, 1958.该书最早在1947年以希伯来语出版(הדרך למבואותופיה, Tel Aviv: Am Oved, 1947),1950年首次翻译成德文出版,书名为 *Pfade in Utopia*;但在1967年的德文第二版出版时,书名改为 *Der utopische Sozialismus*。该书的英文版由 R. F. C. Hull 翻译,并于1958年首次在美国出版,而法译本直到1977年才得以出版(Martin Buber, *Utopieet Socialism*, Paris: Aubier, 1977)。

^③ Martin Buber, *Paths in Utopia*, 139.

^④ 同上, 149。

JEWISH STUDIES

犹太研究

第22辑

基布兹则是他社区社会主义的实验场所与实践基地。布伯将其社区社会主义理论运用到对基布兹实践的分析与指导时,同其他理论与实践结合时所表现出来的问题是一样的,实践的历史性、具体性与多样性使得原本理论得到修正和发展。总的来说,基布兹很大程度上符合布伯描述的纯粹社会。真实的基布兹大体上符合布伯对真正社区的描述,但是与其理想的基布兹有着一定差异;布伯理论中的“相互依赖、相互之间的责任、劳动、联盟、统一、民主、平等等要素都存在于真实基布兹中的方方面面。但是基布兹的纯粹主义本身就是一种混合,多样性同样存在于这些要素中”^①。由此,我们可以说,布伯的社区社会主义与现实的基布兹有着重要的联系,但是二者之间的差异也很明显。在布伯用其理论观察、分析与支持现实中的基布兹运动时,其社区社会主义表现出了新的内容与特征,这种新内容与新特征又构成了布德基布兹社会主义理论的主要内容。

首先,基布兹是犹太复国的一个可选的有效模式,“我们对神一无所知,但我们知道他将显现的地点,这个地点就是社区”^②。虽然布伯并不认为基布兹是未来唯一的真正社区,但基布兹能够解释神的存在;并不只有律法才能解释神的存在,社区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是神意的体现。“真正的宗教不是特殊的指引,而是生活的部分。”^③犹太教的本质在于通过敦促犹太人承认世界神性的前提下,将其生活整体放于神旨之下。“犹太人历代遵守犹太教 613 条戒律,意图实现律条更高的控制最终却落空了。民族生活绝不会成为正义与公正的一部分。只有整体性地尝试去除那些限制的条件——一个具体的社会,一个友好的社会……现在,我们可以在我们自己的国家生活。我们拥有多种多样的公共定居点,定居点对人类新社区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④布伯从犹太传统以及对犹太教应对犹太人困境不力的分析中判定了基布兹对犹太人来说是一个崭新起航,不管是从社会层面还是从犹太传统层面来讲。犹太传统的衰落促使了基布兹自我开放,并作出了必要的改变。

其次,对话哲学视域下的集体观。布伯认为作为集体的基布兹是个体间“面对面”“心连心”的交互关系。由此,基布兹内部矛盾的解决之道在于健全成员之间的“心连心”联系,理想社区应该体现在个人与个人之间以及个人与社区之间的精神默契。“人们应对另一个人真心地说出你,和其他人真心地说出我们。”^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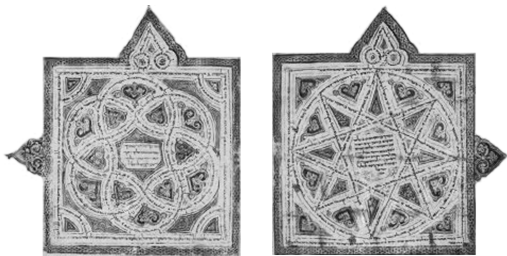
① Henry Near, “I-Thou-We: Buber’s Theory of Community and the Kibbutz,” 269.

② Shalom Lilker, “Martin Buber and the Kibbutz,” 73.

③ 同上,74。

④ 同上,75。

⑤ Martin Buber, *Between Man and Man*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1947), 176.



相应地,社区对个人拥有完全责任。社区的责任是其成员的福利,是对个体之间的相互关怀和对所有人的关怀。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基布兹被认为是“终极福利国家”。布伯反对集体对个人自由与个性的剥夺,认为这样的集体“不是将你我连接在一起,而是捆绑在一起”^①;在这样的集体中,“人的被孤立状态并没有得到克服,相反却被极度权力麻痹……个人归属集体也就直接放弃了个人决定与责任的权力”^②;集体与个人的关系将不再是“我们”与“我”的关系,而变成了“我们”与“他们”的关系。从某种意义上,布伯对社区和个人关系的这种表述是他对个人与个人关系的一种理想化的延伸。总的来说,布伯社区社会主义中的“我和你”在基布兹中表现为基布兹成员之间双向的紧密联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表现为成员之间的相互责任,“我和我们”之间的关系表现为一种建立在自愿基础上的联盟,而布伯的“对话”则表现为基布兹中实行的直接民主和完全平等制度;在这些核心原则之下,基布兹形成了一种以个体间紧密连接为主要特征的社会主义集体观。

再次,劳动的精神价值。在布伯看来,劳动并不仅仅为基布兹未来提供可持续性的物质条件,更重要的是它是一种共同价值的表述。“一个有共同信念的集体只能在集体劳动中才能真正存在。”^③在基布兹成员心中,基布兹事实上是劳动的合作,是所有创造形式的结合。尽管在基布兹内部,大家对劳动的理解会有所差异,但毫无疑问的是,各样的身体劳动都是基布兹思想的核心要素。只有合作的劳动才是实现最终目标的途径,合作的劳动不仅能够给社区带来肉眼可见的物质利益、更高的生产力、更先进的文化科学水平,更重要的是,劳动是一个能够保持社会稳定的有效工具,为基布兹理念的延续提供源源不断的精神动力。布伯对劳动作为一个核心概念与价值维持基布兹成员间关系的纽带作用大加赞赏,但同时也认为不应过度地强调具体劳动而忽略了普遍劳动的意义,因为对具体劳动过度的强调会相应地带来对个体权益与自由的剥夺。

最后,基布兹内部民主的缺陷。基布兹的民主也被称为“圆桌民主”。基布兹产生的初期,社区解决所有问题与贯彻民主都通过“圆桌会议”的方式来进行。“成员间基本的忠诚和信任与形式上的不信任构成了一个系统,日常生活的审理与错误就在这种模式中得以解决……圆桌晚餐与谈论在最初的基布兹中有着无

① Martin Buber, *Between Man and Man*, 31.

② 同上, 201—202。

③ Martin Buber, *Paths in Utopia*, 135.

JEWISH STUDIES

犹太研究

第22辑

上的权力……成员在晚饭前后交换意见与讨论成了解决问题的基本形式。”^①后来,人们将这种民主称为“圆桌民主”,它是社区最为重要的社会价值之一。但是,这种在小范围内实行的民主天然地具有某种可操控性。在基布兹的发展历程中,我们能看到这种民主实行过程中掺杂着各种利益、冷漠、欺压、愚昧与暗箱操作等情况。布伯将这种失败归于基布兹的封闭与教条化,后来更是将基布兹民主与外界的联系视为其成功与否的标准。“这个新的集体公社从他们联盟开始,联盟本身又成了他们的内部原则。”^②另外,布伯也意识到了基布兹未来发展的一个严重的威胁与挑战,并警告说:全球社会不仅会越来越少地受到社会主义农村公社的影响,而且会反过来对它们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并试图同化它们。^③70多年后的今天,人们只能承认,这个警告非常具有预见性。

三、世俗基布兹还是宗教基布兹？

在布伯那里,基布兹是“真正的社区”的一个“不曾失败的实验”。换言之,基布兹是人类实现真正社区社会的一种有效手段,也是那时最接近理想社区的一种社区模式。然而,从类型学上来讲,基布兹又可以划分为世俗基布兹和宗教基布兹。那么,世俗基布兹与宗教基布兹谁更接近布伯理想的社区模式?布伯给出的答案无疑是宗教基布兹。

巴勒斯坦地区的宗教基布兹运动发端于1929年,第一个实体性的宗教基布兹社区建成于1937年。总的来说,宗教基布兹是在共有社会理念的框架下糅合犹太教信仰、犹太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的集体生活的社区模式。^④宗教基布兹与世俗基布兹最本质的差别在于社区是否坚守正统犹太教信仰,而在其他方面并没有表现出太多的差异。所以,要厘清布伯更认同宗教基布兹作为真正社区模式的原因,就需要考察宗教与犹太教在布伯社区社会主义思想中的位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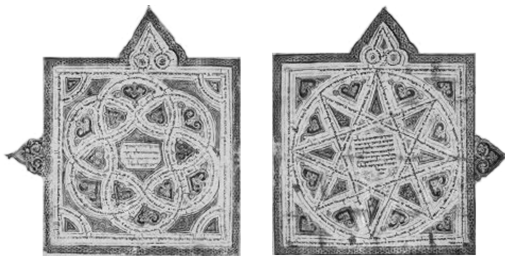
首先可以肯定的是,布伯的社区社会主义为宗教保留了很重要的位置。布伯于1928年撰写了《关于宗教社会主义的三个论题》一文,从文中可以看出,宗教与社会主义的结合能走向他理想的真正社区(或社会)。可以把布伯给出的三

① Muki Tsur, “The Intimate Kibbutz,” in *Kibbutz: An Alternative Lifestyle*, eds. David Leichman and Idit Paz (Ramat Efal: Yad Tabenkin, 1997), 11.

② Martin Buber, *Paths in Utopia*, 141.

③ 参见 Michael Löwy, “Martin Buber’s Socialism,” 104。

④ 参见 Aryei Fishman, “The Religious Kibbutz: Religion, Nationalism and Socialism in a Communal Framework,” in *Studies of Israel Society*, ed. E. Krausz (New Brunswick: Transaction Books, 1983), 115-123。



个论题归纳如下：其一，宗教社会主义是宗教和社会主义在本质上相互指导，它们需要对方来实现其自身的本质^①；其二，真正的宗教和真正的社会主义必然会相遇^②；其三，宗教和社会主义在真理中的相遇点就是具体的个人生活^③。通过布伯关于宗教社会主义的三命题可以看出，在布伯那里，真正的宗教和真正的社会主义是一致的或者说是一回事。而现在的宗教和社会主义之所以表现得相互对立，其原因在于布伯时代的宗教与社会主义都偏离了各自真正的方向。

那么，为什么以正统犹太教信仰为基础的宗教基布兹会是理想的模式？布伯认为，一个理想社区的建立必须要有建立者，而这个建立者往往不是政治领袖，而是那些“站在伟大社会的开端，站在人类转折点上强大启示的背后”^④的

^① 参见 Martin Buber, *Pointing the Way: Collected Essays*, ed. Maurice Friedman (New York: Harper & Brothers, 1957), 112. 原文为：“论题一：宗教社会主义并不意味着宗教和社会主义二者简单的结合，即二者都能在离开对方的情况下独立地实现其目标。宗教社会主义也不是二者契约式的结合，即将它们的自主性结合在一个共同的存在体和工作之中。宗教社会主义只能意味着宗教和社会主义在本质上是相互指导的，它们中的每一个都需要对方来实现其自身的本质。宗教是人类自身与上帝的捆绑，只有在人类共同体的意愿中才能达到其充分的现实，只有上帝才能在其中着手他的王国。人类是一个整体，人与人有伴，除了与神圣中心的共同关系外，不可能有其他发展，即使这又是一个仍然无名的中心。与上帝的统一和受造物之间的共同体是一致的。没有社会主义的宗教是没有实体的精神，因此不是真正的精神；没有宗教的社会主义是抽空了精神的身体，因此也不是真正的身体。没有宗教的社会主义听不到神圣的召唤，它不以回应为目的，即使它还是会作出某些回应；同样，没有社会主义的宗教听到了召唤，但不会作出回应。”

^② 参见 Martin Buber, *Pointing the Way: Collected Essays*, 113. 原文为：“论题二：要判定某种‘宗教’形式、机构和社团是真实的还是虚构的，这取决于它们是否是作为真正的宗教的表达、形状和承载者，即人类对上帝的真正的自我约束，还是仅仅与之并存，甚至是为了掩盖其对实际宗教的追求，这包括人类在此时此地的具体回应和责任。同样，要判定某种‘社会主义’倾向、方案和政党是真实的还是虚构的，这也取决于它们是不是作为人类真正成为一个团体的力量、方向和工具，还是仅仅存在于其发展的边缘，甚至掩盖了其真正的社会性，而这种社会性包括了在此时此地人与人之间的直接生活。目前，流行的宗教形式、机构和社团已经进入了虚构的领域；而当下流行的社会主义倾向、方案和政党还没有出现在虚构中。就目前来看，宗教的表象和社会主义的表象还是相对立的；但在未来的隐秘的领域内，它们的相遇是必然的。”

^③ 参见 Martin Buber, *Pointing the Way: Collected Essays*, 114. 原文为：“论题三：宗教和社会主义在真理中的相遇点就是具体的个人生活。正如宗教的真理不是由教条或规定的仪式组成，而是在与上帝的奥秘的真正互惠关系的深渊中站立和承受，所以社会主义的真理不是教义和策略，而是在与人的奥秘的真正互惠关系的深渊中站立和承受。正如‘相信’某种东西而不充分地生活在自己所相信的东西中，那么这种相信就只是一种推测；同样，希望‘完成’某种东西而不充分地生活在自己想要完成的东西中也会沦为一种推测。当我们在‘这里’不致力于实现它时，那么在‘那里’它就会拒绝把我们交给我们；所以，当‘现在’不承认和实现它，‘那时’它必须拒绝我们。宗教必须知道，政治、社区与和平是让奉献神圣化或被亵渎的日常。而社会主义也必须知道，决定所达到的目的与以前所珍视的目的有多大的相似或不同，取决于追求该目的的手段与既定目标有多大的相似或不同。总而言之，宗教社会主义意味着个人在其个人生活的具体性中认真对待这种生活的基本要素；他这个人是在上帝面前和世界中的。”

^④ Dan Avnon, “The ‘Living Center’ of Martin Buber’s Political Theory,” 6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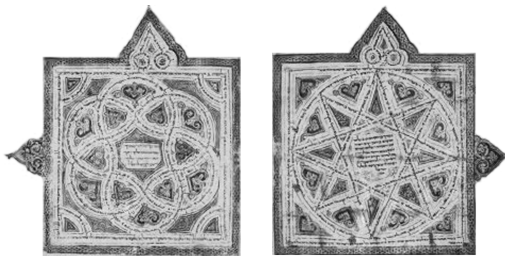
JEWISH STUDIES

犹太研究

第22辑

人,他们建立了人类可以充分认识自己的生活方式,例如佛陀就找到了“不分彼此地面对不分彼此的神秘”的方法,并由此推动了一场运动,将“我和你”的关系转化为一种实质性的“之间”的关系。真正的社区和真正的领袖是不可分的,社区的延续代表着“之间”关系实质性地持存下去。摩西无疑也是这样的一位领袖:摩西是一个将人、社区、社会复兴与启示结合在一起的中间纽带;摩西想要建立一个社会框架让以色列人成为圣洁的人民,成为神圣教义的承载者;摩西建立的盟约把以色列各族团结为一个民族,并将他们与上帝连接在一起,不仅仅是宗教上的连接,而且也是生活实质上的连接(守律法)。这种盟约就在人际关系上创造了“之间”的状态。盟约既是以色列人与耶和华之间的,也是以色列各支派之间的。只有他们成为耶和华之约的伙伴时,他们才是以色列人;与此同时,他们又都活在单独的关系之中。也就是说,摩西创造了社会条件使得以色列人与上帝联系起来,上帝是神圣的中心,没有摩西创造的条件,以色列人无法与上帝联系或彼此结合。摩西就成了这种社区(社会)生活方式的关节,将精神引入了日常生活的实质,由此将“我与上帝的关系”和“我与同胞的关系”从本质上关联起来。对布伯来说,上帝的国度不是“彼岸世界的安慰”,也不是“天上的神圣”,而是“人类的完整共同生活”,是“真正的社区”,同时也是“上帝的直接主权”与在地上的王国。

综上所述,布伯在其新社区概念的基础上形成了社区社会主义理论,而当这种理论与实践中的基布兹运动相遇时便产生了共鸣;当布伯用这种理论来分析和指导现实中的基布兹建设时,实践的历史性、多样性与复杂性迫使布伯不得不不断地调试自己的理论,继而产生了其基布兹社会主义思想。毫无疑问的是,布伯的社区社会主义在面对基布兹实践时表现出了强大的理论影响力,基布兹内部思想受布伯哲学的影响也非常大。但是在这样一幅理论与实践相交织的历史画卷中,理论与实践始终没有办法统一。从某种程度来看,布伯的这场理论实验无疑是失败的。其一,从布伯理论的原点来看,他的理想社区必然无法接受不可避免的制度化进程;因为制度化将使人际关系失去个性,同时进入“我和它”的关系中,这就意味着基布兹的现实走向了他所批判的对立面了。布伯也很清楚地意识到这一点,这也是后来他对基布兹中的民主制度化表示出担忧的原因。其二,现实中的基布兹社区要想在竞争性的社会环境中生存下来,追求效率与管理制度化成为基布兹领导层不得不作出的选择。这种基布兹实践与布伯理论之间的普遍与明显的矛盾一直存在着,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早期受到布伯思想影响的基布兹领导人与布伯的关系事实上并不亲密。布伯的基布兹是人类最理想的社区,但并不是基布兹人想要的社区。除非这种理想社区能被证明可以在基布兹存在,否则这个设想只是一个智力创造品,而不能被称为基布兹。其三,从基布



兹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在过去 100 多年的时间里,基布兹经历了创建、建设、繁荣、危机与改革的过程,基布兹内部的思想、价值体系等方面都发生了多次演变。然而,并没有一个现实中的基布兹与布伯所描述的理想社区是一样的。尤其是布伯身后的基布兹改革与重建过程中,大部分基布兹都选择了一条与布伯所设计的基布兹图景相左的路线。